

河南省財政貿易工作躍進經驗叢書

全面跃进中的粮食工作

第一輯



河南人民出版社

糧食問題和思想問.....	(4)
分清糧食問題的大是大非.....	(9)
糧食統購統銷好得很.....	河南日報社論 (10)
事實說明統購統銷政策好得很農民生活有提高...	蘇殿選 (19)
新新社的事實充分說明糧食問題是思想問題.....	張嘉祥 (23)
展開糧食問題的大辯論.....	河南日報社論 (24)
開展社會主義大辯論提高覺悟明辨是非正陽農民辯論后	
踊躍增售余糧.....	葛榮煌 (34)
張君墓鄉的富裕中農大辯論后紛紛出售多年陳糧	
.....	張乃昌 (35)
魚米之鄉——羅山縣農民再次深入開展糧食問題大辯論...	(36)
喊叫農民糧食消費水平低是沒有根據的幾年來偃師縣	
農民吃糧不斷增加.....	(39)
糧食到那里去了?	河南日報社論 (42)
當前大辯論的中心內容.....	河南日報社論 (48)
堅決取締糧食投機活動.....	河南日報社論 (53)
七里營農業社算了五筴大賬弄清糧食到那里去了的問題	
.....	(57)
富裕中農申小掌一心要走資本主義道路囤糧七千多斤還	
帶頭鬧糧.....	(59)

糧食問題和思想問題

(1957年8月5日“人民日報”社論)

過去一年中，我們國家的糧食狀況是怎麼樣的呢？這是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要回答這個問題，先看兩方面的事實：一方面，國家征購所得的糧食比上一年度少了三十九億斤。另一方面，國內市場銷售的糧食比上一年度增加了一百二十七億多斤。其中農村多銷六十八億多斤，城市多銷五十九億多斤。今年糧食銷量還有繼續增加的趨勢。征購減少了，銷售要增加，這就不能不動用國家的糧食庫存。這是十分不利的情况。

是不是我國糧食的生產減少了呢？不是的。1956年我國遭受了自然災害，這是事實。但是，由於農業合作化和國家在各方面對農業的支援，全國糧食總產量還是增加了。今年的夏收，一般的也并不壞。可是，為什麼征購數目減少了呢？這是由於很多地區糧食雖然豐收了，但是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教育卻放鬆了，農村中滋長了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只要加強了思想教育，糧食征購數目就可以大為增加。今天本報發表的山東泰安縣上高鄉征購糧食的事例，有力地回答了這個問題。

泰安縣上高鄉購糧的原定計劃是七十七萬斤。這個數目本來不高。可是當地幹部都缺少完成的信心，他們甚至害怕連五十六萬斤也完成不了。但是，經過對廣大羣眾進行深入的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教育，打通了思想，從根本上改變了大家對於賣余糧的錯誤態度，從消極態度轉為積極態度，

結果不仅完成了原訂計劃，而且大大地超过計劃，完成了八十三万斤。

上高乡的事例說明，粮食問題里面有思想問題。在思想向着資本主义方向倒退的时候，粮食問題就緊張起来；相反的，在思想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时候，粮食問題就会趋向緩和。

目前的粮食問題显然是由于有些思想問題沒有解决而引起的。一般地說来，現時在农民羣众和农村干部中有一些錯誤的思想需要加以批判。

首先應該批判只顧自己、不顧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是个体农民所固有的。过去經過长期的革命战争和解放以后革命斗争的教育，許多农民已經克服了这种思想，爱国主义的觉悟已經大大提高。但是，由于我們在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期間和以后，沒有来得及进行一次深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所以还有許多农民思想認識沒有跟上發展的形勢。有一些人甚至覺得：合作化了，我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資料都归公了，我是“公家人”了，于是一切都要由公家充分供給，实行供給制。从前家庭內次要劳动力和小孩多半吃稀的，現在一律要吃干的。从前在农闲时节吃得較少，現在也和农忙时节一样多吃。吃完了就伸手向社里要，社里不給就吵鬧。他們覺得吃多了是淨賺，吃少了就吃亏。湖南攸县有的农民一年一人吃八、九百斤谷，还嚷着不够，有的說一人一年要吃一千二百斤谷才够。安徽省小麦收了以后，有的农民一天吃三斤小麦。在叫嚷不够吃的人們里面，除了少数人真的不够吃以外，其余大多数并不是不够吃，而是想把自己装成缺粮戶，以便多要粮食。有一部分是对合作化心怀不滿，希望合作社垮台的富裕中农；也有一部分是盲目地追隨富裕中农、

思想比較糊涂的下中农和貧农。山西解虞县有一个社今春有十分之九的社員喊缺粮；后来經過教育和評議，实际上只有十分之一的社員缺粮。这种只顧自己、不顧国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如果不克服，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設就会受到严重的損害。

其次，在社和乡的干部中，有一些人有严重的本位主义。他們只顧本社本乡的农民眼前的一点小便宜，看不到农民的长远利益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他們采取集体隱瞞产量、少报收入、多报損失、多报缺粮等各种办法，使本乡本社可以少卖余粮，多得供应。河北滄县最近对基层干部进行教育的結果，許多人觉悟提高，現在已經报出隱瞞的粮食产量十多万斤。目前这种自报粮食的工作还在繼續中。这証明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是必須克服的，也是能够克服的。

还有，县以上的干部有些也把合作化的目的了解得非常狹窄，以为合作化就是單純为了大家現在分得多一些，吃得更飽一些。他們很少想到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农民的前途問題。如果为了整个国家的利益而需要限制一下粮食的消費，他們就覺得这是“对不起农民”，好象作了亏心事。这些人片面地認識党所提倡的羣众观点，以为羣众观点就是單純为羣众爭取眼前的福利；至于說怎样用先进的思想去教育农民，使农民看得見自己的远大利益，他們就不加以注意。因此，他們对于乡、社干部的本位主义和农民的个人主义，很少进行必要的批判和糾正。这就使得这些錯誤的思想蔓延起来。

現在我們已經面臨着一个严重的思想工作，这就是要向广大的农民羣众和农村干部說明：如果不顧国家利益和整个社会主义事业，要把个人的和本单位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就是在实际上取消了社会主义，取消了党的領導，同时也取

消了农民的远大前途。在粮食問題上完全可以考驗每一个农业社的社員和干部，究竟誰是真正拥护社会主义的，誰是真正爱国的。这是实际的考驗，不是口头上表示态度所可比。

有的同志认为，国家任务和羣众需要之間的矛盾是无法克服的，二者是不能兼顧的。他們忘記了我們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領導的国家，我們要建設社会主义这是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因此，国家的任务和人民的要求在根本上是統一的。当然，在实际工作中不是一切都順利，总不免会有困难。正因为这样，我們才需要进行艰苦的調查和研究工作，想出各种办法，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一面不要浪費粮食，一面要使农民够吃，不使有人挨餓。而这样的兼顧是可能的。当然，城市工矿区、經濟作物区和災区人民的粮食供应量也要有一定的限制，不能有求必应。

我們在粮食問題上必須用全局观点来教育干部和羣众。占人口七分之一的城市工矿区，平均每年大約占人口十分之一左右的受災地区，占全国耕地面积近十分之一的經濟作物地区，統統需要国家供应粮食。国家如果不供应粮食，城市工矿区的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設、交通和其他建設事业就不能进行；經濟作物区就不能供給工业原料，工业化資金的积累就会受到重大影响；災区广大人民也就不能进行生产自救，社会秩序当然也就会受到不利的影響。

为了建設偉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們必須坚决克服各种錯誤思想，从各方面努力来增加征粮和购粮的数量，縮減粮食的銷量，增加国家的粮食儲备，使我們能够应付可能遇到的災荒和其他困难。在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1954年和1956年都是災年。这两个災年差一点連在一起。很明显，如果国家不能积聚起足以应付連續两个災年的粮食儲备，我們的計劃

就不能认为是十分稳妥可靠的。因此，我們希望所有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在粮食問題上要充分地發揮积极性，以身作則，帶动羣众，努力节制粮食消費，多交余粮給国家。我們相信广大干部和羣众在明白了国家粮食基本的情况以后，一定能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努力完成粮食战綫上的任务。

分清粮食問題的大是大非

（195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社論）

在我国农村中，千千万万农民正在展开关于粮食問題的大辯論：辯論粮食統购統銷政策对不对，执行情况好不好，农民应该怎样对待統购統銷。通过这个辯論，可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社会主义觉悟，批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教育农民更加自觉地执行統购統銷政策，支援国家的經济建設事业。

粮食問題在旧中国是从来没有解决的問題。历代的封建朝廷一直到国民党反动政府，都不愿意，也不可能解决这个問題。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粮食問題，一方面，发展农业合作社运动，把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用集体力量发展生产，增产粮食和各种經济作物；另一方面，实行粮食統购統銷政策，在粮食产量还不能充分滿足各方面的需要以前，实行社会主义的計划分配办法，保証供应各种必不可少的需要。

从1953年开始，粮食統购統銷已經实行了四年。它保証我国六万万城乡人口在生产不断发展的条件下都有飯吃，而且一年比一年少吃糠菜多吃粮食。它滿足了社会主义建設期

間对于粮食的迫切需要，我們的粮食战线几年来基本上是稳定的。它帮助我们战胜了1954年和1956年的大灾荒，粮价一直稳定未漲。如果没有統购統銷政策，如果听任粮食商人在市場上兴风作浪，哪能出現这些“奇迹”？广大农民身受統购統銷的許多好处，因而是拥护这个政策的。

可是，这并不等于說人們对統购統銷政策的看法都是正确的，对統购統銷政策已經沒有任何誤解、不滿，甚至抵抗。所以还有必要展开这次辯論。

有人說：“統购統銷政策是好的，如果能够再多留些粮食就更好了。”有这种思想的人相当多，他們都主張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銷。首先應該辯論：这种看法对不对？国家是不是购得太多，銷得太少，是不是應該购得更少，銷得更多？

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几十年，解放以后努力建設社会主义，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近几年来，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已經提高了許多。1949年农村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只有四百斤左右，当时多数地区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貧农、中农占有的粮食比这个数目还要低得多。到1952——1953年度，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增加到五百二十多斤，1956——1957年更增加到五百九十多斤，比剛解放的时候多了一半左右。这个平均数跟其他經濟发达的国家比起来虽然还是低的，但是在我国历史上却是空前未有的，对于占我国农村人口絕大多数的貧农和下中农來說，五百九十多斤更是过去无从想象的大数字。除去种籽和飼料，按照每个地区不同的生产水平規定的口粮，有的三百多斤，有的四百多斤，有的五百多斤，都比解放以前多許多。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东邻西舍，多少家把稀飯換成了干飯，多少家把野菜換成了粮食，多少家不再借貸，“告

帮”，靠着自己的收入过着有吃有穿的日子！今天的生活怎么样，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絕大多数农民心里是很清楚的。

能不能把农村的留粮标准更提高些？随着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留粮标准将来一定要繼續提高，但是現在还没有这种可能。对于粮食的分配，必須要有全局观点，把各方面的需要都照顾到。1956年是我国生产粮食最多的一年，每人平均約有六百一十斤。口粮、飼料、种籽、工业用粮、出口粮食……都出在这六百一十斤里，那一項都不应该漏掉。农民的口粮如果繼續增加，城市和工矿区居民的口粮、工业建設用粮、經濟作物区农民的口粮以及缺粮农民和灾区农民的口粮就不能保証。这样，別的不說，首先工业就发展不起来，国家工业化的任务就不能实现。我們的粮食生产不能大量增加，主要原因之一正是沒有社会主义的大工业，因而水利建設还不够多，化学肥料产量太少，等等。要发展农业必須发展工业。如果沒有强大的工业支持农业，如果粮食总产量不能大量增加，在人口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怎能提高口粮标准呢？

南方出产粮食比北方多，那里的口粮标准能不能提高些？也不可能。江南許多地区是粮食高产區，全年农业劳动時間长，一般农民吃粮在习惯上就比北方多，这些情况国家在确定留粮标准的时候已經照顾到了。华北是产棉区，南方的粮食必須有一部分接济华北，支持华北生产棉花。否則华北一部分棉田势必改成粮田，大家的穿衣問題就要紧张起来。丰收地区的粮食有富余，那里的留粮标准能不能再提高些呢？这也不应该。丰收区必須用一部分粮食接济歉收区，不然，誰来支援歉收区的同胞呢？今年的丰收区明年遭了灾荒，又靠誰来支援你們呢？

如果有的人一方面表示拥护粮食統购統銷政策，一方面

又要求无限制地提高粮食消費量，这是說不通的。我国农民原有艰苦朴素，勤儉持家的好习惯。在解放前的困难日子里，人們尚且可以精打細算，量入为出，尽可能把日子安排得好过些。現在多数人的口粮比过去大約多了一半，日子豈不是更加容易安排了么？至于說：“粮食統购統銷政策有些不方便”，那更是一种片面的、只顧自己不顧大家的看法。有些余粮戶覺得不能把全部粮食留在家里自由支配，是“不方便”。有些缺粮戶如果沒有統购統銷政策，就沒有粮食吃，豈不是更不方便嗎？可見方便不方便，不能从形式上看。在旧社会里，沒有实行过統购統銷，农民好象可以随意支配自己的粮食。其实，对多数农民來說，收下粮食先繳地租，接着賤价卖粮还高利貸；在青黃不接的季节，或者高价买粮，或者举借新債，哪里有什么方便！那时候，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可以任意欺压和剝削农民，他們倒是很自由、很方便的。現在农民过着沒有压迫、沒有剝削的生活，多数人留有够用的口粮，一部分缺粮戶有国家供应，少数受災戶有国家救济。农民过着无忧无虑、越来越好好的生活，什么时候这样自由、方便过？

为了保护这种大方便、大自由，應該自觉地接受某些暫時性的小拘束和小不方便。有余粮的农民應該适当地节制消費，按照規定把粮食卖给国家。这是农民支援国家建設的义不容辞的責任，也是农民互助渡荒最有效的办法。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国家和农民防災、抗災的力量大大增加，可是还不能制止和消灭自然灾害。从1953年到1956年，每年平均有一亿五千万亩耕地成災，可見我国的农业生产还不够稳定。任何地区都有遭災的可能，任何地区的农民都需要国家的援助。因此，無論哪个地区，哪个合作社的农民，在丰收的年

度和季度，都应该尽可能多卖粮食给国家，帮助国家支援受灾的农民。不缺粮的农民应该自觉地不要买粮食，缺粮户更应该节制消费，按照规定的数量和时间买粮食。国家的粮食都是向农民征购来的，你要国家多供应粮食，也就是要国家多向别的农民征购粮食。如果大家都提出这种要求，国家怎么办呢？新中国的爱国农民哪能作这种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事！

我们这样做，当然会有一些人不高兴。地主、富农因为生活不如从前了，一部分富裕中农占有的粮食也少了些，所以对统购统销不满。

对地主、富农破坏统购统销的言论和活动，要随时加以揭露和打击。他们只要有机会，是不肯放松这种罪恶活动的。江苏江浦县龙山乡有个地主名叫张继尧，前些日子挑拨农民说：“解放以前你们只给我交五十担租；现在你们卖余粮、交公粮，被政府弄去一百多担。统购统销有什么好处！”一百担确实多于五十担。可是，龙山乡过去只有一个张继尧吗？全乡的农民每年只交五十担租吗？地主收了地租干什么？政府收了公粮、买了余粮干什么？这道理农民最清楚，是用不着多说的。地主破坏统购统销政策，挑拨政府和农民的关系，正是为了那五十担租，为了重新把农民踩到脚下。针对地主的阴谋，要和他們进行坚决的斗争，彻底把他們的犯罪活动打下去。

对一部分富裕中农对统购统销政策不满意的，应该进行思想教育；对其中抗拒粮食统购统销的少数人，必须进行适当的说理斗争。过去富裕中农的生活为什么好？那是因为他们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耕畜和农具，经常雇些忙工，兼放部分高利贷，收的钱粮用不完，有些人就到市场上作投机生意。他们自己看起来，生活的确很不坏，手头是很方便的。可是，

他們所以能够雇人，是因为有人必須卖工；他們所以能够放債，是因为有人必須借債；他們所以能作投机生意，是因为有人必須忍受賤卖貴买的剝削。他們的好生活同样給貧困的农民造成許多痛苦，这难道是應該的么？一部分富裕中农对合作化有意見，不滿意統购統銷政策，这表示他們还在留恋过去的生活，想从社会主义后退到資本主义。貧农、下中农和愛国的富裕中农能够允許他們这样作么？而且，在旧社会里，富裕中农的經濟状况也是不稳定的。少数人投机成功，可能变成富农或地主。多数人投机失敗，加上天災人禍的襲击，就会破产变成貧农。就是为富裕中农打算，执行粮食統购統銷政策支持国家的經濟建設，給全体农民（当然包括富裕中农在內）創造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美滿的生活条件，也是只有好处沒有坏处的！

关于粮食問題的辯論，在解放以后，已經进行过好几次。每次辯論都有很大的收获，都提高了农民的社会主义覺悟。誰是愛国的，誰不是愛国的；誰真心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誰还想倒退到資本主义，这些問題在辯論中，特别是在卖余粮、买統銷粮的实际行动中，不能不弄清楚。我們相信，經過这次辯論，絕大多数农民将会进一步分清粮食問題上的大是大非，多卖少买，厉行節約，用实际行动証明自己愛国家、愛社会主义。

粮食統購統銷好得很

（1957年7月12日“人民日报”社論）

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煽起了一股妖风。他們想趁此机会夸大我們工作中个别的或者局部的偏

差和錯誤，抹煞成績，以煽動迷惑一些立場不穩或者不明是非的人和他們一道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企圖使資本主義復辟。他們製造了“統購統銷糟透了”、“統購統銷以後糧食不夠吃了”、“糧食統購統銷對農民太狠了”、“糧食統購統銷打擊了農民的積極性”、“統購的糧食都叫工人和城市里的人們吃了”、“共產黨把糧食弄到外國去了”、“共產黨不能代表農民利益”等等惡毒的謠言和謬論。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究竟是糟透了，還是好得很？歷史事實是最有力的證據。

解放以後，經過了土地改革和其他經濟措施，連年獲得豐收，糧食生產超過了解放前的最高水平，加上供應方面的有效工作，基本上保持了糧食市場的穩定。但是，當廣大農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以後，糧食消費水平逐年提高；隨着國家建設事業的發展，糧食需要量也在逐年增多。糧食商人和其他私商利用糧食自由市場的存在，趁機套購囤積糧食，進行投機搗亂活動，使農村的余糧戶貯存觀望，等待高價，不願早賣余糧，造成國家的糧食收購計劃不能完成，銷售計劃大大超過，出現購銷的緊張情況。很明显，如果讓糧食自由市場繼續存在和發展下去，勢必出現糧食供銷脫節的混亂局面，以致牽動全面物價的波動，影響廣大人民的生活和國家建設。為了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把糧食供應放在長期穩固的基礎上，除了努力促進農業合作化和技術改良，大力增產糧食以外，就必須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建立社會主義的糧食分配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制止私商和富農操縱糧食市場的活動，使國家能夠掌握必要數量的糧食，以保證廣大人民對糧食的合理需要，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的四年中，虽然有两年遭到了較大的自然灾害，我省的粮食仍然是逐年增产的。如以1952年的粮食总产量（包括紅薯折粮，下同）二〇五·七亿斤为一百則1953年为109.3%，1954年为114.7%，1955年为124.9%，1956年为127.28%。这就說明了由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更加切实的保持了物价的稳定，促进了农业合作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怎能說是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呢？统购统销政策的确打击了少数剝削者的投机倒把的积极性，正是因为这种积极性受到打击，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才能激发。四年当中国家征购了多少粮食呢？1953年征购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23.5%，1954年是24.1%，1955年是23.3%，1956年是18.29%。这說明了国家征购粮食的数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除1954以外，是逐年减少的，而农民手中留有的粮食是逐年增加的。农村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1954年为四百九十斤，1955年为五百一十一斤，1956年为五百四十四斤。1956年比1955年提高6.46%，比1954年提高11.02%。这里必須指出：国家不但沒有统购了农民的口粮，也沒有统购了农民的全部余粮，除了給农民留下必須的口粮、飼料、种子等等以外，国家统购以后，农民手中一般还有20%左右的余粮，有的还可能多一些。留給农民的粮食，农民是可以自行調剂使用的。特别是从1955年实行粮食三定政策以后，在定产以外增产的粮食，大部或全部归农民处理，1956年以前，国家对这部分增产的粮食，沒有统购，1956年因为部分地区遭灾严重，从增产的地区增购了一部分粮食，但是一般也沒有超过其增产部分的40%。所以，除了灾区

和缺粮戶以外，大部分农民实际吃的粮食数量一般是远远超过国家规定的留量标准的。根据农村九百九十三戶四千九百五十八人的实际吃粮情况典型調查，1954年平均每人吃粮三八八·五四斤（原粮，下同），1955年为四一七·二四斤，比1954年增加7.39%；1956年为四三一·二九斤，比1954年增加11.01%。即使災区和缺粮戶按照国家供应标准买足了粮食也是够吃的。应当說明，所謂三百六十斤、三百八十斤、三百九十斤，是国家在向有余粮的农民进行統购时规定的免购点和对缺粮戶的供应标准，并不是所有的农民只是吃到这么多的粮食。那种把工作中发生的个别的或者局部的偏差和錯誤，使部分农民只能吃到或者甚至沒有吃到統购留量标准的現象，不加分析地当作普遍的整个的現象，显然是錯誤的。右派分子利用一部分人这种錯覺，把粮食統购統銷的缺点夸大为統购統銷这个政策要不得，难道不值得我們警惕嗎？應該承認，現在这样的吃粮水平是不算高的，但是誰都懂得，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是决定于生产发展速度的，几年来的事实說明，粮食消費水平的增长已經是不算慢了，如果超过了粮食生产发展速度，粮食从哪里来呢？戴着一副关心农民生活的假面具的右派分子会有什么高明的办法嗎？

讓我們再来看看农村各阶层吃粮数量的变化吧。根据二千九百九十九人的典型調查，1954年每人平均吃粮（原粮，下同），貧农三四三·三二斤，中农三六七·九二斤，富农四四八·九二斤，地主三二八·八七斤；1955年每人平均吃粮，貧农三八七·六九斤，比上年增加12.95%，中农四三〇斤，比上年增加16.87%，富农四〇七·三斤，比上年减少8.27%，地主三八一·四斤，比上年

增加15.97%。这些材料說明实行粮食統购統銷以后，广大农民吃粮水平不但沒有下降，而且都在逐年增加，并且增加的幅度是相当大的，占农村人口60—70%的貧农和下中农，在旧社会中一般是处于“糠菜半年粮”的半飢餓状态，而少数地主富农和奸商却囤积粮食，借以剝削广大劳动人民。实行粮食統购統銷以后，广大农民的吃粮水平大大提高了怎么能說統购統銷以后农民的粮食不够吃了呢？的确，那些过去靠粮食这个宝中宝来压榨剝削广大劳动农民的地主富农和投机商人，現在确实是不能再靠粮食剝削农民了，可是他們吃的粮食比一般农民也并不少啊！如果是和他們过去的剝削生活作比較，倒确是降低了。但是，这是完全應該的。他們所以罵我們国家的粮食統购統銷精透了，不就是因为这一点嗎？难道說昨天还是吸食劳动农民血汗的地主恶霸、奸商資本家，今天就忽然那么关心起人民的生活了嗎？

是不是工人和城市里人民比农民吃的粮食还要多呢？在实行以人定量供应以前，城市中的粮食消費是有浪費現象的，甚至出現过城乡粮食倒流的情况。以人定量的办法实行以后，城市居民的供应标准是按照每人的劳动强度和年龄的差別来核定的，除了全年劳动强度大的劳动者的供应标准較高以外，一般市民的平均供应标准，比农民的統购留量是低的，他們每人每月平均吃粮如折原粮計算也只有二十五斤十三两。把全部的城市人口平均計算，吃粮数量也只比农民的統购留量标准高三斤多。而且农民的薯类作物大部分沒有計算在口粮标准以內，如果把这些計算进去，农村的吃粮水平并不比城市居民低。在吃粮品种上，城市居民也是要求多吃些杂粮的，但是在杂粮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就把杂粮优先供

应了灾区和缺粮的农民。难道这不是从农民特别是灾区农民的利益出发嗎？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故意夸大“工农生活悬殊”，借以煽动农民对党和人民政府不滿，挑撥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的阴谋，只要把实际情况一摆，就会破产的。

国家統购的粮食弄到哪里去了，是有帳可查的。我省1953年征购的粮食（貿易粮，下同）四十八亿斤，銷售粮食四十一亿斤；1954年征购五三·一亿斤，銷售四三·六亿斤；1955年征购五十六亿斤，銷售三九·一亿斤；1956年征购四四·八亿斤，銷售四八·六亿斤。以1956年的粮食銷售为例，供应农村有二八·二亿斤（占銷售总数的58.04%），其中灾区占36.3%，經濟作物区占16.9%，粮产区缺粮农民占25.2%，农村的飼料种子占9.1%，治淮、治黄等事业用粮占6.02%，农村熟食业用粮占6.3%。銷到城镇的粮食只有二〇·四亿斤（占銷售总数的41.9%），其中居民口粮占65.43%，熟食业用粮占14.32%，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用粮占12.02%，酿造、飼料事业用粮等占8.23%。这說明大部分粮食还是供应了缺粮农民的需要。解放前，1942年的大灾荒，全省餓死三百多万劳动人民，而实行粮食統购統銷以后的1954年和1956年，我省在受严重水灾的情况下，沒有餓死人，这不是一个鮮明的对照嗎！四年来，除了特大灾情的1956年外，国家确实每年从我省調走了一部分粮食用来支援大城市、工矿区和歉收地区。1953年調出三·一亿斤，1954年調出七·四亿斤，1955年調出九·四亿斤。这是我省农民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設应尽的光荣义务。我国現在还是一个經濟和文化落后的农业国，为